

汪曾祺在沪期间,曾三次短途旅行到外地。一次是1947年春跟致远中学几位同事畅游杭州。这次经历未写入小说,只在1989年一篇散文中略为谈及。另两次是1946年夏去镇江看望在那里行医的父亲汪菊生,以及1946年底至1947年初去扬州(汪父第三任妻子任氏娘家)与亲人团聚。他在“听水斋”完成的好几篇小说都写到这两次镇、扬之行,其中《囚犯》很值得一说。这个短篇发表于凤子(封季王)主编的《人间》1947年10月1日二卷一期“特大号”,收入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1949年4月出版的《邂逅集》(汪曾祺平生第一本自编短篇小说集)。

《人间》接纳《囚犯》

——汪曾祺在上海之六

邵元宝

《囚犯》写“我”和父亲走出临河的某小城,下河堤,过浮桥,挤上河对岸的长途汽车,半小时到江边,再换乘过江轮渡。由上述细节推测,这应是写1947年初过春节,汪曾祺和父亲一道离开扬州,先乘运河大堤上的汽车到江边码头,再坐过江轮渡到对岸的镇江。小说写到父子二人登上轮渡,进入“小房舱”喝茶,便戛然而止。最后提到“今天晚上,我就要离开我的父亲,到一个大城市中去”,暗指汪曾祺在镇江告别父亲,连夜返回上海。《囚犯》至少有一半篇幅描写久别重逢的父与子微妙的情感波动。“这个离别的十年,这个战争加在我们身上的影响还是不小啊!家庭制度有一天终会

崩坏的。”第一人叙述者“我”的感慨,可谓一篇之“文眼”。

明明是小说,《人间》编者却将其定性为“报告”,显然是要凸显小说另一主线所揭示的国民党军队官兵之隔膜与敌对、底层士兵的困厄以及群众对兵士的嫌弃,以呼应当时社会普遍的反戾战情绪。

该期《人间》编得很用心。一些原本“决定排入”的稿件由于特大号的关系“不得不挪至下期”,杂志也推迟十天出版。凤子“希望以后都能维持‘特大’的面目,自然更希望在质的方面,也能维持二卷一期的水准”。在此背景下推出《囚犯》,且用粗体字排在目录显要位置,居茅盾、王任叔、郭沫若、许寿裳、徐迟、赵景深、胡风之后,臧克家、萧乾、戈宝权、戴望舒、唐弢、梅志之前,足见编者对它的赏识。

《人间》杂志社设在四川北路118弄南仁智里45号(武昌路口),从书店林立的福州路和棋盘街出发,沿四川路桥移步至苏州河对岸,再有两三分钟便可走到。据凤子回忆,“编辑部每月召开一次编委会,也就是发稿会,决定发的稿件早在上一次编委会上议妥,分头组织来的稿件早已交换审定,发稿会一边研究个别需要讨论的文章和下一期选题,同时负责版面的丁聪就当场画版式”。召开编委会的地点并非南仁智里,而在凤子居住的“北四川路万

人夏,杨柳不再鹅黄,杨柳青青,杨柳成条。古人善写杨柳,摘一则:

暖风晴日断浮埃,废路新条发钓台。处处轻阴可惆怅,后人攀处古人栽。(晚唐薛能《杨柳枝之四》)

杨柳枝词,唐教坊曲。一说为白乐天首创,以咏杨柳得名。白居易、刘禹锡都是写杨柳枝的高手。白十四首,刘二十首(合杨柳枝词与竹枝词)。尤刘梦得“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句流传千古。杨柳枝前承乐府,后从七绝化出,因其清新明快,中晚唐诗人多作此调。明人胡震亨引洪迈曰,薛能《海棠》《荔枝》《折杨柳》诗皆无过人(《尊前集》)。与乐天梦得比,薛能《杨柳枝》已是夕阳。然此调浑然天成,不负洪迈赞美之辞。

薛能《杨柳枝》共十八首,专咏杨柳八首。每首皆有新意。“汴水高悬百万条,风清两岸一时摇”(之六);“数首新词带恨成,柳丝牵我我伤情”(之十一);“晴垂芳态吐牙新,雨摆轻条湿面春。别有出墙高数人,不知摇动是何人”(之十五)。

岁馆五楼那朝南的大屋子”。通常一上午就能商定所有编辑事务,然后大家“一块上北四川路一家小馆吃一顿粤式中餐”。这些人聚在一起,自然会谈到新近从昆明来上海、正天女散花一般在平津沪三地发表小说散文的青年作家汪曾祺。

《人间》编委包括凤子、丁聪、马国亮、李嘉(后改为冯亦代),但“实际上从筹备到每期待定稿,叶以群既是经理又是编委会的主持者”。在《人间》辟出“报告”专栏并将《囚犯》归入这一特殊文体,很可能就是三四十年代一直高度关注“报告(文学)”的叶以群的主张。叶以群1947年11月14日秘密护送郭沫若离沪赴香港,他完全有时间指导一个多月前出版的

夜光杯

杨柳二则

刘火

薛能,字太拙,官至武宗工部尚书。

杨也,柳也,杨柳也。杨枝硬而扬起,故谓之杨,柳枝弱而垂流,故谓之柳,盖一类二种也。《本草纲目》杨柳于濒湖老人,为一类二种。然唐人,杨即杨柳即杨。“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王之涣《凉州词》);“桥东桥西好杨柳,人来人去唱歌行”(刘禹锡《杨柳枝》);“苏家小女旧知名,杨柳风前别有情”(白居易《杨柳枝》)。词牌杨柳,抒情杨柳。杨即是柳,柳即是杨也。《水浒传》第七回《花和尚倒拔垂杨柳 豹子头误入白虎堂》,亦可见杨即柳柳即杨。一代大诗人有“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前句分,后句合,有分有合,亦为一创制也。

杨柳,诗家不分,非文人愚拙,乃文人智慧。杨柳,药学家分,非药学家智慧,乃药学家本职。

今植物分类学:杨柳,被子植物。杨,杨柳科,杨属;柳,杨柳科,柳属。

另,杨枝,用杨木作梳齿,沾水以祝福健康。



《人间》特大号的编排。对主编凤子来说,汪曾祺并非文学新人。现存汪曾祺1940和1941年最早问世的两篇小说《钓》和《翠子》,就由当时跟孙毓棠一起住在昆明的凤子经手,发表于她在繁忙话剧活动间隙兼职编辑的昆明《中央日报》“平明”副刊上。

四十年代初凤子编发汪曾祺稿件,照例通过沈从文举荐。但六七年之后,在上海的凤子与在北平的沈从文闹过一场老大的不愉快,她再度编发汪曾祺文稿,就无需沈从文推介了。

1946年11月13日上海《侨声报》头条转载“本报北平通讯”《沈从文论作家》,几个小标题十分抢眼,诸如“大后方文艺界唯一收获卞之琳、李广田、何其芳”“上海出版物就是印刷好”“不赞同周运动”,以及“巴金、茅盾都沉默,不像郭沫若一般飞莫斯科,像凤子穿得花红柳绿到苏联大使馆去读朗诵诗”……虽然沈从文很快申明该长篇采访录“断章傅会,都成瞎说”,但一经发表,还是严重刺激了一大批身在上海的作家。

凤子次日便投书《侨

声报》,“读十三日贵报第三版所载沈从文先生谈话内称,‘凤子穿得花红柳绿到苏联大使馆去朗诵诗’,读后不胜诧异。沈从文先生之言论本不足深论,但此事无中生有,全系捏造,不得不请贵报代为更正。荷。”凤子仅就采访录涉及自己的部分有所辩驳,对其他内容未置可否,但一句“沈从文先生之言论本不足深论”,已清楚表明她此时对沈的强烈不满。

这以后南北文坛对沈从文及其“集团”的“围攻”愈演愈烈,但凤子和她主编的《人间》不计较汪曾祺是沈的爱徒,只看作品质量与倾向,隆重推出小说《囚犯》,确实难能可贵。

汪曾祺未被“京海之争”40年代后半期余波所殃及,算是一大幸事。包括《人间》在内的上海进步文学界善意接纳汪曾祺,更冲淡了他作为“京派”后起之秀的单一身份定位,使其在文学史现场的归属与色彩变得多元而驳杂。

漂泊一生,从无定所。上世纪80年代从通州挤进上海石库门爱人娘家,90年代当上船长住入浦东单位分房,世纪之交调往深圳,一待便是十年,退休之后终于回归原点上海。搬家无数回,东西没少扔,唯有一样,爱人从未释手。啥宝贝?看官一定发笑,一件夹袄。这“箱子底儿”就是早年上海流行的织锦缎款式。

我们家的夹袄很特别,是从新加坡泰昌布庄专门购置的纯涤纶面料和里子,然后请准海路上的裁缝名店专门制作的新婚礼服。

现如今上了岁数的海员,别的不敢妄言,你问他新加坡的“泰昌布庄”,那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中国远洋船队从60年代起步,欧洲、非洲、美洲、大洋洲,新加坡是必经补给之地。即便是短暂锚泊,船员必在新加坡下地购物。一是新加坡华语流行交流方便,二是新加坡商铺售卖的商品都是领先上海的“时髦货”。

船停新加坡,船员乘小艇在红灯码头登岸。穿过小弄堂,很快来到一条标写Circular Road字样的小街。通街是斜着的,说不清它的方位朝向,唯有墙面上的“1949”可推断是50年代晚期的建筑。通街并不像上海市南的中华路那样是围着老城厢构建的,而是一条通长不过数百米、蜿蜒曲折的商店街。街面两侧多半是两三层高的南洋矮楼房,上面是居室,底层是售卖海参鲍鱼、泰国燕窝等各具特色的小商铺。泰昌布庄便坐落在环马路深入约50米处。在物资匮乏年代,虽无法考证泰昌布庄究竟向数以万计的中国海员出售了多少树皮凉、纯涤纶、的确良布料,那个具有广告效应的“泰昌布庄”黄色购物袋几乎填满所有中国海员回国公休的行李箱,却是不争的事实。

“泰昌布庄”之所以能在国内各大远洋公司名闻遐迩,还在于这些公司的船舶代理人便租住在毗邻的华侨银行大厦。锚地的船一旦提前开航,国内总部要是有个紧急通知,代理人首先会打电话给泰昌布庄查问某轮船员们有没有到达,或直接步行过来与下地的船长碰头。所以,泰昌布庄还具备了联络站的功能。

“老板,请进,请坐,请里面坐。”白净的小个子老头在布庄门前笑脸相迎。一听“三请”,笔者不由得想起苏东坡给寺院写的那副“坐、请坐、请上坐;茶、上茶、上好茶”的对联典故来。随着店堂前的吆喝,里间的伙计麻溜地端上来几杯冰镇酸梅汤。自动摇头的落地电风扇送出袭袭凉风,很容易让人想起傍晚时分靠芭蕉扇纳凉的上海人家。新加坡商铺的营销模式,让众多见惯了国内商场营业员严肃面孔的海员觉着新鲜好奇。当那可口的酸梅汤亲手送到你手上,后面自然而然会紧跟:“老板,不来几块料子送给太太和爱人?这是最新款的德国布料——”那种宾至如归的感觉会让人感情难却。

“来一块吧!”一进店舖,我便瞄好了一块绛红隐格纯涤纶料子。“纯涤纶”三个字是我上船之后才听说的。第一次看到如此养眼的颜色,关键是其质地,比当年上海凤鳞角的毛涤还要挺括,摸在手上滑滑的,掂在手心沉沉的,不免怦然心动。“老板,你真有眼光。她多高?是做上衣还是裤料啊?”其实,我也就是在端着酸梅汤杯子围着布摊不经意地摸了一下那匹涤纶布而已,不想察言观色的小老头竟然洞穿了我的心思。“这种料子刚刚面子。在上海根本看都看不到。女孩子上衣一般要一公尺三,裤子要一公尺。你上下一起来可以套裁,两公尺二,我可以给你再放一点。”奇了!白净小老头一语中的,我的女友就是上海人。我服了。不买也得买,不由我不买。就在小老头开始下剪刀的时候,



八年前,我经历了分娩的疼痛。那时医生曾教给我两件事,让我至今受用。当阵痛来袭,我仿佛要被抽筋剥肉,瞬间陷进了紧张、恐惧的情绪里,几度挣扎,倍感无望。但幸好,每次阵痛过后,都有大约与阵痛等长的时间,感觉却十分轻松、愉悦,仿佛忽然从泥潭飞升到了云端。

度过阵痛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剧烈的疼痛,会使我们处于应激反应之中,深陷恐惧不能自拔,从而错失了感受轻松愉悦的机会,从而任由痛苦四处弥漫,占据身体的每一个角落,攻陷了整个产程,加深了痛苦的印象,甚至成了产后抑郁的诱因。

我却能清晰地回忆起阵痛间隙的轻松、愉悦,实感自己躲过了一劫。那是因为,在妇幼医院建档后,医生为我设置了产前课程,模拟阵痛的时长和频次,并教我根据自己的节奏,在阵痛时尽力关注呼吸的质量,拉长呼吸的时间,保障身体正常供氧;而在阵痛间隙,尽情地享受轻松和愉悦,不断加深对此种感觉的印象。整个孕期,我进行过数千次的练习。于是,在分娩前的两天一夜,我将那方法熟练地运用到阵痛过程中来。每一

次阵痛时,我都大口地呼吸,氧气注入身体,帮我冲淡了痛苦,使我保持清醒,获得力量;阵痛过后,我贪婪地体会着那突如其来轻松感,想象自己在用意念捻拾着愉悦的羽毛,让它们不断地堆叠,包裹住我的身心。

那位高明的医生,将分娩经历总结为两件事:感到痛苦时,就去关注生命最本质的需求;痛苦过去后,便在日常里捡拾幸福。

所幸,与之相比,生命中的阵痛,强度和频次,都要缓和一些,温柔一些,间隙也要更长一些。甚至有时,长得都快让我们忘了,自己正身处捡拾幸福的最佳条件之中。眼前,医生的那句话已指导我走过了八年时光。我深知,无论自己将“娩出”一个怎样的人生,也都躲不过生命的阵痛,只是时间有长有短,程度或轻或重罢了。为了避免被痛苦掌控,在每一段阵痛与阵痛的间隙,我都极力保持清醒,践行好医生交代我的那两件事。

人生无非就这两件事。做好这两件事,痛苦便不自觉被减轻了程度,而轻如羽毛的日常,也会堆叠成更加清晰而真实的幸福。

人生无非两件事

张吟安

七夕会

这个时节去呼伦贝尔,不但可以看到最美的草原,还可以与漫山遍野的油菜花撞个满怀。虽然地处中纬度地区北端,虽然只能春播,但这里的油菜结籽饱满,花自然也开得别样纯正。更给人视觉冲击的是辽阔:平路上行进时,菜花是一条金线;上坡时,菜花便变成了一片,延伸得很远。这金黄与蓝天的交界处,正有絮般的白云升起。万顷金畴、一望无际,正是呼伦贝尔油菜花有别于江南冬播油菜花的独特“画风”。

比如,当我们低头欣赏完草原盛开的野花,一抬头,蓦见花丛不远处开着一片片油菜花;比如,当我们对着一大片青春的白桦林拍摄时,却发现林下的坡地上一片

金黄;

再比如,毛色油亮的骏马或黄牛在路边草地上悠闲啃草,它们的背景,时常是金亮成片的油菜花。

于是,每次行走在呼伦贝尔的夏天,油菜花成了采景的标配。在上库力一带,油菜花接天盖地;在黑山头东侧,电力风车在油菜花坡上留下迎风旋转的影子;在陈旗,小片的油菜花星罗棋布开在草原边沿,惹得过路的骏马频频回首;在牙克石坡地,声势浩大的油菜花与油亮闪烁的麦子或牧草,交织成大地的天然锦织;在额尔古纳河畔的临江,油菜花恣意向江边铺陈,远远望去,仿佛灿烂到了对岸俄罗斯的山边……

中国最北的油菜花海,如此壮阔浩大。

摄影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